



党的建设与政党理论研究

祁刚利

2006-1-12 10:52:32

来源：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求实 2005. 9 党的建设与政党理论研究 党内民主与苏共衰亡

在当代,随着社会的发展,搞好党内民主已经成为共产党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因而,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要搞好党内民主,借鉴苏共在党内民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国际共运史上,苏共在党内民主方面,曾经有过非常好的经验,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如列宁时期党内民主生活的规范化和正常化。然而,苏共在党内民主问题上也出现过巨大的失误,如斯大林时期党内民主的缺失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内民主的泛滥,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极为严重的损失。

一、斯大林体制与苏共党内民主和苏联社会民主的缺失

斯大林体制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有:党政不分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和全盘集体化等等。斯大林模式导致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严重缺乏民主,普通百姓远离权力中心。党领导一切变成了党包揽一切。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了一个人说了算。比如,苏联在很长时间内,斯大林一人独揽党政军大权,一切重大问题都由斯大林拍板决定。甚至从1939年至1952年长达13年的时间内,斯大林一直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也只开过两次,一些重要的人事安排或大政方针的制订,往往敲定在他的私人饭桌上或与亲信的闲谈中;斯大林还把本来直接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责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划归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从而使党内监督失去力量 and 作用;在苏共内部,主要领导人都实行终身制,或指定接班人;党的干部选举制让位于党的干部任命制;在党内生活上,以阶级斗争代替自由争论。这就使苏共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政治局甚至是党的总书记一人成了党的权力来源,而党的权力的真正来源——广大党员通过选举授权的党的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则形同虚设。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践踏,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缺少党内民主制约的一些苏共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对上司阿谀逢迎,溜须拍马,对下级则趾高气昂,视若草芥。由于失去群众监督,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特权思想严重,生活腐化堕落。人民群众对此敢怒而不敢言,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成了廉价的宣传和花哨的装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领导者听不见也不愿听来自基层党员和社会底层人民的呼声,提出批评者则往往被视为“阶级敌人”,并被投入监牢。没有民主的政党,必将越来越没有生机和活力,一切因循守旧、僵化等死;而没有民主的社会,矛盾必将越积越多,怨恨越压越深,表面似湖面风平浪静,深层若地火奔涌欲吐。一有突发事件,社会将会如火山一样爆发。

苏共倒台、苏联解体后,许多学者认为,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而是缺少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僵化的斯大林模式,葬送了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戈氏只是充当了“送葬人”的角色。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研究商榷的。

缺少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斯大林体制虽然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能也不应该把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或全部责任推到斯大林模式上。这是因为,斯大林模式虽然建立于斯大林执政时期,但并未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而结束,而是延续了30多年。在这期间,苏联曾创造了辉煌的

业绩。应当看到,斯大林体制的形成与当时周边的险恶环境有关。列宁领导的苏共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此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采用军事进攻、舆论诬蔑、经济封锁等各种手段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疯狂进攻。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有铁的纪律和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才能战胜敌人,保存自己。因而高度集权而缺少民主的斯大林体制在当时以至靠后一些的年代里,是有存在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的。但是,苏共领导人在以后的和平环境中,不能及时调整政策,而是把高度集权、高度统一的战时体制,这一保卫新政权、保卫人民的暂时的行政手段,当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的。斯大林以后的苏共领导人不能或不愿把党的权力归还给广大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时间一长,这种高度集权而又没有民主基础的体制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并带来了种种弊端。正如列宁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如果说斯大林体制的建立同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关,这些因素妨碍着斯大林在世时对这个缺少民主体制的弊端进行清醒的认识并加以改革的话,那么在斯大林去世后,这些因素均不再存在,对这个没有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体制进行科学分析并加以改革,以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已经具备了条件。遗憾的是,西方的“冷战”使斯大林的继任者都神经过敏,他们害怕实行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会使敌人乘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自身素质问题,他们或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真正的关键性问题,或是认识到了而不想放弃手中的权力,总之,苏联领导人都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这就使社会的矛盾越积越多,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重。但是,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之前,斯大林体制并没有走到病入膏肓,不可医治的地步。如果那时的苏联及时采取正确的补救策略和方法,仍然可以逐步化解矛盾,消除弊端,重新走上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因为社会主义毕竟是历史大河中不可阻挡的潮流与方向。但是,急功近利的戈尔巴乔夫却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

二、戈尔巴乔夫与苏共党内民主和苏联社会民主的泛滥

应当说,戈尔巴乔夫还是比较有眼光的。他清楚地看到斯大林体制几十年运行中暴露出种种弊端,并认识到造成弊端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民主——党内没有民主,社会也没有民主。因而,他提出:“民主化是改革的主要动力和完成改革的唯一途径。” [1] (p119) 为此,他在党内和国内积极倡导“公开性”、“多元化”和“民主化”。“民主化”“公开化”的口号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戈氏脱离实际,搞过了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戈氏执政后,在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效的情况下,转向了政治体制改革。他继承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想,在苏共27大报告中称斯大林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变形的社会主义”,是“专横的官僚行政体制”。由于戈氏带头主张毫无限制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一时间,国内的各大党报党刊上的一些所谓“反思”文章,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意的诋毁和中伤。斯大林被描绘成反复无常、残酷暴虐、具有迫害狂和杀害狂的“专制君主”;斯大林主义成了法西斯主义和专制集权的代名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被称为一部专司屠杀无辜、民族清洗的恐怖政治机器。戈氏把自己的无能造成的社会危机全推到死人身上。他宣称:苏联人民今日的苦难就是过去苏联实行“斯大林专制社会主义”所造成的恶果,声称“同过去的一切历史决裂”,“应当炸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 [2] (P256)。戈氏的言论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在一些人对此提出疑问,并建议应有所约束时,戈氏在1988年1月8日宣称:“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

然而,实际上“毫无限制”的只是传播西方文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对斯大林体制进行抨击的言论与行动。

不加辩证分析地否定斯大林及社会主义制度,严重丑化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对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起到了很大的瓦解作用。反共势力乘机号召清算苏共的历史罪行,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年代称之为“黑暗年代”。苏共对此不能进行有力的反击,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暗淡了,苏联走向全面的政治文化信仰危机。然而,苏共垮台的最根本原因还不在于这里,而是在苏共28大上,戈尔巴乔夫对党的民主集中制进行的修改。加强党内民主本是一件好事,也是必须要做的事,但戈尔巴乔夫几乎完全否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主张:各级党组织实行“自治原则”;下级的决议只要不违背党的纲领目标,上级不得撤消,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可以不执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允许党员成立不受党委领导的党组织、党的俱乐部,事实上是允许了党内派别的公开化。从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苏共的党内民主化实际就是抛弃民主集中制,把民主普遍化、庸俗化、扩大

化,无原则地扩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权力,苏共党内的民主变成了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民主被曲解为不要任何纪律约束。这使苏共内部意见分歧、纪律松弛、离心离德、党派林立,几乎没有任何凝聚力。这为以后苏共分裂,进而一部分派别变质从而从内部搞垮苏共种下了祸根。

戈尔巴乔夫在否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后,依然认为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还不够,并把缺少民主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党的领导地位造成的政治垄断的结果,因而要求取消党的领导,效法西方“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和多党制。

多党制在苏联的推行,欺骗和迷惑了許多人,使他们把救世良方寄托在多元化和实行多党制上。斯大林体制是高度集权的一种体制,它在战争年代或险恶的环境中是有强大生命力的。但是,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这一体制被神化因而拒绝自我革新,进而僵化。由于不能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缺少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斯大林体制严重挫伤了劳动人民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负责精神,使社会主义原有的潜力和优越性无法发挥。斯大林的后继者,虽然也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改革,赫鲁晓夫甚至从人格上完全否定了斯大林。但他们只是对这一体制的修修补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随着社会形势的逐渐恶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似乎已经走到尽头。一些人因此对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能力丧失信心,对在一党制条件下进行彻底改革的可能性产生怀疑。在戈氏提倡“多元化”后,这些人开始向西方寻找“救世良方”,而最现成的方案,就是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戈氏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取消共产党的法定执政地位,主张把执政的共产党改造为政治多元化的派别俱乐部和议会党,不顾苏联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全国推行多党制和自由竞选。劳动人民几十年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所积累的怨气如火山一样喷发,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趁机扶植一些资产阶级代理人,不断攻击谩骂苏共。在内忧外患的危机下,苏联就似一座古老的大厦轰然倒地。

三、以苏为鉴,搞好党内民主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回顾苏共70多年的执政史,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在民主问题上所犯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其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对这种高度集中的、僵化的斯大林政治体制模式进行根本改革,不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就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党员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各方面的较量和斗争中,我们就会处于被动状态,时间一长,就必然会败下阵来。但是如果像戈尔巴乔夫那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党内和社会上推行激进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民主与自由,割裂民主与集中、民主与纪律、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只能更快地搞垮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要解决好党内民主问题,必须以苏为鉴,辩证地把握好党内民主匮乏和泛化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从制度和程序上对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进行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保证党内民主的正常运行,而不能像苏共那样在党内民主问题上忽冷忽热,冰火两重天。具体说来:

一是要从传统金字塔型权力结构逐步向扁平化的网络型权力运作模式转化。从苏共在民主问题上的失误和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历史来看,共产党在党内民主问题上有过比较好的传统,同时也有过惨重的教训。而党内民主之所以出现问题,一方面在于党内民主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学者也大多从这个角度来论述,并一再强调要加强党内各项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期望以制度保证党内民主的根本实现。但是,从苏共和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和各种党规党纪来看,制度层面有时已经很健全了,但这些党章、党规、党纪却不时被违反,党内民主依然得不到健康运行,我觉得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组织的传统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

所谓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就是指权力的运作主要是自上而下,少数人掌握着社会的大部分权力,处于权力的优势方,大多数人处于权力的劣势方。因而,政党内部的民主总是处在缺失或不健全的状态。

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与政党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有关。20世纪之初,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斯就通过对欧洲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主要指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的考察,得出了“寡头统治铁律”这样的结论。他认为,随着现代政党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党走向了专业知识的时代,形成了政党的组织化、体系化,导致政党的组织操纵在极少数的精英手中;这些人控制着政党的日常政务,在实际上影响

政党政策的决定, 党员只有服从党领袖的领导。“寡头统治铁律”理论的中心内涵是, 所有的政党必然逐步演化成寡头统治的组织, 政党越大, 这一现象也就越严重, 距离民主的理念也就越远, 党员对党内事务就越无发言权。米歇尔斯认为, 政党内部之所以会导致寡头统治, 原因在于组织本身。在他看来, 组织正是形成寡头统治铁律的根本原因。因为有组织, 就必然有领袖。领袖在长期参与政治的实践中逐渐具备了平常人所不具备的专业技能。如由于所处环境, 他们能够熟悉政治生活的所有技术性环节; 作为党的代表进入立法机关, 在议会活动中熟悉了财政问题、外交问题和其他经济、政治、社会问题, 并在议会中受到特殊的训练, 学会了议会斗争艺术; 在处理日常党内事务中, 掌握了越来越多的专业管理技能和专业知识; 等等。这些专业技能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造成了领袖在组织中的长期、稳定地任职的要求。在这之外, 再加上群众固有的种种缺陷(如迷信、感恩、自私、对政治冷淡等), 寡头政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铁律。米歇尔斯据此断言, 寡头统治铁律是“历史铁律中的一种, 这一铁律是最民主的近代社会和这些社会中最先进的政党都没有能够逃避的”。虽然政党是为民主而建的, 但随着组织的发展, 政党民主却不断下降。米歇尔斯说, 政党“是这样一种组织, 这个组织助长了被选举者对选民的支配, 助长了发号施令者对听命者的支配, 助长了代表对代表选举者的支配。谁说组织, 谁就是在说寡头政治”。[3] (P410)

这些论述曾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界广泛的争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无论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 在历史上都曾出现过缺少甚至缺失党内民主的状况, 如法西斯政党、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等等。即使当今号称实行民主政治的欧美资本主义政党, 以及真正追求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中国共产党也都在党内民主问题上依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 如资产阶级的党魁制, 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民主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等。

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之所以能对党内民主构成巨大威胁, 核心在于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于上层而缺少制约。我们可以说, 苏共权力过分集中于总书记一个人身上, 一方面使斯大林肆意对苏共党内民主进行窒息; 另一方面, 戈尔巴乔夫也是利用总书记的大权把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变成向人道社会主义的改向。而由于他们处在金字塔权力结构的顶端, 大权在握, 党内民主不能正常运转, 因而没有人和机关能够阻止他们的所作所为。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目光敏锐的邓小平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指出: “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 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 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 必然造成官僚主义, 必然要犯各种错误, 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4] (P329)

要从根本上解决党内民主问题, 应该构建一个网络型权力结构, 它是指权力的运作如同网络, 互相制约, 互相平衡, 谁也不处于优势地位, 这样党内民主才会真正地实现良性运转。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 网络的运转呈高效率状态。网络型权力结构与金字塔型权力结构相比, 网络型是一种更稳定、更体现个人自由的权力结构。另外, 网络型结构是一种更富弹性的结构, 容易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和冲击。当然, 从金字塔型结构要过渡到网络型结构, 需具备重要的两个条件: 一是社会成员的普遍理性化和知识化; 二是科学技术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

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条件来看, 我们还不可能立即采用这一政党组织结构形式, 苏共戈尔巴乔夫也正是在条件不成熟时就放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大搞极端民主化, 从而把政权丢掉的。但是, 政党的权力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扁平化的网络型转变是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方向。我们应该在加强各种制度建设以保障党内民主的有效展开的同时, 在社会实践中有意识地适当扩大党内基层民主, 逐步减少权力结构中的纵向环节, 并采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方式渐进地构建一个新的网络型权力运作模式。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党内民主的改革举措, 其中, “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 [5] (P36) 是加强基层民主、使传统金字塔型权力结构逐步向扁平化的网络型权力运作模式转化的第一步。

二是不断加强党员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 培育党内民主的新文化, 同时, 注意防止民主的泛化及指导思想多元化思想。

一个国家、民族,有着自己特定的历史、传统和环境。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形成特定的氛围,塑造着一个民族、国家不同于其他民族、国家的特征。人们对于这种氛围的认知以及由这种认知而逐渐形成的习惯、风俗,就是文化。因此,我们可以说,政党文化就是指一个政党内部广大党员表现出来的认知、习惯和风俗等。比较正规的政党文化的定义可以表述如下:“政党所具有的为全体成员所认同的意识形态(或说政治思想)、组织心理、制度规范、行为作风以及由此决定的政党形象。”[6] (P13)

苏联和中国都属于文化大国,两国的文化在客观上对苏共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产生着重大影响。由于两国都有长期封建专制传统,国民素质(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在内)中民主意识、民主精神、民主习惯都非常缺乏。这直接造成了政党文化中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的缺少。一些党员和群众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而领导干部缺少民主意识、民主精神、民主习惯则是造成苏共和我们党党内缺少民主进而产生各种失误的根本因素。

因而,我们党一定要重点做好对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民主精神、民主习惯的培养和教育,积极培育新的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要求相适应的政党文化。只有党的领导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有了浓厚的民主意识、民主精神和良好的民主习惯,我们的政权运作才会正常化、科学化和民主化。

在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民主精神、民主习惯的培养和教育中,要注意防止戈尔巴乔夫在加强党内民主问题上犯的错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加强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旗号下,先是毫无原则地批判斯大林,进而攻击马克思主义对党和社会的指导造成了“精神垄断”,积极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毫无原则的民主化、公开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使人们思想混乱,共同理念和信念淡化或消失,党内纪律松弛,民主集中制遭到根本的破坏。这种极端民主化的最终结果,不仅使改革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而陷入混乱导致失败,也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意防止民主的泛化及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倾向。

三是要加强党内民主程序建设,稳步推进党内民主的实现和发展。

党内民主程序,是指党的各级组织在处理党内政治生活时所必须遵循的方式和步骤。从苏共的历史来看,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些党内民主的基本制度,并且党章对党内民主也有个别程序上的规定,但从总体来看,这些程序规范缺少详细、完备的方法和形式,比较原则、笼统,不易操作,而且缺乏有具体惩戒措施的监督性、保障性规定。由于苏共对党内民主权利的规定过于抽象、原则,缺乏可操作性,造成了党内民主在实际执行中的走样。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严重存在着,家长制作风、官僚主义也屡禁不止,党内民主在很多方面得不到真正的落实。

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民主程序上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而没有程序的党内民主是缺少制度保证的空中楼阁。因而,要加强党内民主,就必须把民主建立在一套切实有效的程序规则基础之上。具体而言主要是建立以下几种程序以捍卫党内民主。

1、规范党代表大会的选举程序,切实保证广大党员民主权力的实现。党的各级代表大会是广大党员通过其党员代表处理党内大事的主要载体。要实现党内民主,必须要保障广大党员的权力,而要保障广大党员的权力,就必须建立和制定自下而上的党员代表提名制度或自荐报名制度;在代表产生过程中,要制定代表产生的竞选程序,党代表的产生要坚持公开、公平、竞争的原则,采取差额选举的办法,在党内逐步形成竞选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党员的党员意识和参加民主选举的积极性,保证党内民主的真正实现。

2、规范党代表大会发挥作用的程序,保证党代会多数人决定党内事务的权力。由于全国和地方党代会每五年举行一次,而且党代表不实行常任制,使党的代表大会无法决策党内重要事务,它的权力由党委会或常委会代为行使,而在党委常委中,往往又是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说了算,少数服从多数的党内民主原则,由于缺少权力执行程序上的保障,变成了事实上由少数人决定党内重大事务的做法。对这一问题,可以采用党的大会代表常任制以及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的方式来解决,从而最大化地发挥党的代表大会的作用。

3、规范党内重大问题民主决策程序,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当前,家长制、一言堂依然在党内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党内民主决策的程序的完善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因此,建立起一套重大问题的民主决策程序,从确定议案,到投票表决,其具体操作应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有法可守,这是十分必要的。

4、制定刚性的监督制约程序,规范党员领导干部行为。对违反程序的每一个行为要制定明确的处罚措施,以保证党的民主规章、制度、准则真正贯彻实施。

参考文献:

- [1]戈尔巴乔夫. 改革与新思维[M] .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 [2]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 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N] . 真理报. 莫斯科:1986-02-26.
- [3]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 政党[M] . 纽约:美国多佛尔出版公司,1959.
- [4]邓小平文选(第2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
- [6]赵理富. 政党文化探析[J] .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02. (5) .

转载请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